

古代调研重寻“拔本塞源”之策

《人民法院报》刘永加

“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,成事之道。”在古代,有作为的帝王、大臣和官吏,都是在做好调研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。当然,他们的方法各有不同,但大多注重问题导向,因病求方、对症下药,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,在历史上留下不少有关调查研究的佳话。

微服私访听民意

提到古代帝王官员的调研,人们会想起来微服私访,这一活动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,为后来历代贤明君主大臣所效仿。

古时候的调研除了微服私访,帝王官员也会轻车简从下基层,也有的是前呼后拥下基层,但是归根结底,要看调研的成果。

唐代时,有一位帝王就创新了微服私访式的调研,他能够利用一切外出的机会,去了解民情民意,他就是唐宣宗。作为唐代后期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,唐宣宗“久历艰难,备知人间疾苦”。因此,他即位后,不仅“虚怀听纳”群臣进言,还特别留心地方官的政绩,以便能够及时进行升赏。

一次,唐宣宗出宫射猎。途中,遇到一位樵夫,宣宗立即驻马,开始了他的微服私访式的调研。他问樵夫是哪个县的人,樵夫说是泾阳人。宣宗接着问:县令是谁?樵夫回答:叫李行言。宣宗更进一步问:“为政何如?”樵夫也不知道是皇帝在问话,就照实回答:“性执。有强盗数人,军家(指北衙禁军)索之,竟不与,尽杀之。”宣宗听后若有所思,自认为陌生人的评价更中肯。

回宫后,唐宣宗认为泾阳县令能够不避权势、为民除害,于是就将这个县令的名字记下来贴在寝殿的柱子上。一个月后,海州刺史空缺,宣宗立即将李行言任命为海州刺史,并赐“金紫”穿戴。

“水晶灯笼”灯下明

在一切工作中,最怕的是灯下黑,有些官员好高骛远,往往对发生在身边很近的人和事没有看见和察觉。

在宋代,有一位官员就善于解决“灯下黑”的问题,因此被老百姓誉为“水晶灯笼”。

这位官员就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开封考城县人刘随。他以进士及第入官,被任命为永康军(今四川灌县)判官。

刘随到任永康军后,他知道许多问题都需要走出去寻找解决办法,那就是深入辖区去考察调研。他先是来到当地孔庙,见到庙宇杂乱污秽、荒草丛生,听说负责管理祠庙的楼店务已将庙中一片空地租了出去,准备营建居舍。刘随当即下文给楼店务,责令其立即收回出租之地,并维修管理使用好孔庙,从而“使蜀人知有圣人”。

在调研中,他发现永康没有水井,当地居民饮用水,全都依赖附近的导江之水。每到冬季,江水冻结,人们只得去离城二十里处取水饮用。由于饮水艰难,人们常常饮食不时,不少人因此患病,甚者死亡。人吃水尚且如此困难,那就更难以喂养家畜家禽,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。更为可怕的是,一旦发生火灾,也难得一勺灭火之水。

面对这一严重情况,刘随下决心修建一项通水工程,根除永康的缺水之患。他徒步登上永康城附近的鱼兔山去考察,发现这座山可以俯视全城,且山后有一股很大的泉水,如果能将泉水引到

城中,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用水问题。于是,他通过实地勘查,终于找到引水入城的办法,组织人员开展工程建设,将泉水导入了永康城。

基层调研减赋税

走群众路线,是调研的最基本出发点。想通过调研了解实情,必须扑下身子,与百姓打成一片。

在明代,官员调研已经成为常态,多数官员能够做到深入基层,知民情解民意纾民困。周忱便是其中一人。

明宣德五年(1430年)九月,正担任工部右侍郎的周忱被任命为江南巡抚,总督税粮。而彼时的江南作为发达地区竟然拖欠国家税赋。

周忱来到江南,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。一天晚上,周忱微服私访,经过一个村庄时,见树下有个人坐着乘凉,便上前同他搭话。直到属员们找到这里,那人才知面前的人竟是江南巡抚。就这样,周忱从百姓口中了解到了许多实情。

周忱是个办事仔细认真的人,他身边常带一个记事簿,在深入基层调研时,无论大事小情,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,连每天天气如何也都记录在册。起初人们都不知这样做有什么用处。后来有一次,有人报告说运粮船因大风翻沉。周忱翻开记录簿,那天根本没有风,骗局一下子就被戳穿了。

通过微服调研,周忱从百姓那里了解到,江南之所以拖欠那么多税粮,主要是富户不肯交纳赋税之外的加耗部分。这部分加征就只好摊派到一般农户头上。针对这一情况,周忱回来立即研究,最终创立了“平米法”,无论大户还是小户都要严格平均承担耗米。又请工部颁发铁斛,让各县依式制造,革除了各地粮长大斛入小斛出的弊病。

周忱还了解到,以往各粮区设粮长正副三人,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办理公文,然后再送北京户部,往返费用均由百姓分担,因此百姓负担很重,苦不堪言。

于是,周忱予以改革,下令各粮区只设一人,轮流赴南京,然后交由有关部门上送北京,这样果然减轻了百姓的负担。江南拖欠税赋的问题慢慢地解决了。

寻拔本塞源之策

调研的一个重点就是坚持问题导向,在调研中去找到问题症结之所在。

清雍正四年(1726年)由广西巡抚调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的额尔泰,不久向雍正帝连上奏折,大谈西南几省改土归流问题以及解决办法。听到额尔泰上奏折再次提出改土归流,“盈廷失色”,大臣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。因为早在额尔泰之前广西提督韩良辅、贵州巡抚石礼哈和毛文铨、云贵总督高其倬等都向雍正帝提出过改流建议,但均遭到雍正帝的驳斥。

然而,大家没想到的是,雍正帝看了额尔泰的奏折后,却立即批准,并委以重任,命令他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大臣们颇为不解,后来雍正帝才说明了其中的原因,前面韩良辅等人,一是没能拿出具体方案,所言只是“小知小见,乃攀枝附叶之举,非拔本塞源之策”;二是他们“非能办理此事之人,故未允其请”。

原来,此前额尔泰在广西任巡抚时就对此事已经做了一些调研,所以知道改土归流的紧迫性。此番新任云贵总督后,他更是加大了调研力度,坚持问题导向,直面百姓问计。

额尔泰在调研的基础上,分析了整个形势,适时提出了改土归流的重大决策,制定了全面的改流方案。他连上几个奏折,详细阐述了改流的必要性、迫切性,并强调,“不改土归流,终非远计”,“滇黔必以此为第一要务”。

额尔泰主持了西南几省的改土归流,革除了大批土司,而代之以流官的管理,并实行与内地一样的地方行政制度,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辖,有利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,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、文化的发展。

地名彰廉德

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王影

地以名传,名以人传,人以廉传。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,有不少地名因廉洁人物、廉洁故事而生,其蕴含的精神至今仍闪烁着崇廉向善的光芒。

贪为耻,廉为荣。“廉泉让水”的成语背后包含着多个廉洁地名。南朝刘宋时,在梁州(今陕西汉中)任职州将的范柏年进京汇报工作,宋明帝刘彧与他闲谈时,忽然问道:“广州有水名曰贪泉,据说饮了此水就会变得贪婪,你可知道?”接着又一语双关地问:“梁州是否也有这样的泉水呢?”由此及彼,宋明帝真正的用意是想问你们那里有贪腐的官员吗?

范柏年的回答非常精彩,“梁州唯有文川、武乡、廉泉、让水。”廉泉位于今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,又称廉水、廉津,是至今还在使用的一个名称。范柏年并非单用廉泉回应,而是同时举出“文、武、廉、让”这些寓意美好的地名,且以“唯有”两字强调,可见当地风俗良善。宋明帝随即追问:“卿宅在何处?”范柏

年坦荡以对:“臣所居廉、让之间。”此答亦甚巧妙,既是事实住在廉泉与让水之间,又含蓄表达了自己追求廉洁礼让的品格。

若说到廉洁礼让的品格,“六尺巷”的故事不得不提。在安徽省桐城市,有一条长100米、宽2米的巷子,建于清朝康熙年间,小巷出口有一块刻着“礼让”二字的牌坊。六尺巷源于清朝大臣张英的家人与邻里的土地纠纷,当时双方争执激烈,张英家人便向在京为官的张英寄信寻求支持,没想到张英回诗一首,“千里来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?长城万里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家人阅罢,明白其中含义,主动让出三尺,邻居也深受感动,同样主动让出三尺,这样就形成了六尺巷。

廉洁是清清白白做人、干干净净为官,古人常用“清如水,明如镜”来形容一个廉洁之人。宋代铁面御史赵抃赴成都上任,仅携一琴一鹤,他目睹江水清澈浩荡日夜奔流,不由心有所感,借水立志,指着江水发誓道:“吾志如此江清白。”从此赋予了青白江丰厚的

廉洁底蕴。赵抃说到做到,在成都任职期间,他注重以身作则,每天晚上都会焚香祷告,反思有无不可告天之言。他整顿吏治,提倡节俭,反对奢靡,蜀地由此大治。如今,青白江依旧静谧流淌,成都的青白江区也因此得名。

在美丽富饶的萧绍平原上,有条江好像银色的飘带一般,这便是钱清江。东汉刘宠任会稽太守时,简政爱民、惩治不法,深得百姓爱戴。在离任时,有几位老人从若耶谷中出来,以百钱相送,并说道:“别的太守治理时,派遣官吏搜刮民财,闹得鸡犬不宁。您在任时,政治清明,治下太平,我们得了安宁,所以想聊表心意。”刘宠不肯接受,再三推辞,反复推让不下,为了让老人放心,刘宠从每人手中各取一枚钱,就此告别。出了会稽地界,刘宠便把钱投到了江里,后人将该江改名为钱清江,还建了一钱亭、一钱太守庙。

地名为人所起,一山一水皆有情,承载的是传承已久的人文共识,是我们对廉洁的推崇。



赵抃像。他曾借水立志,愿为官处事如江一样清白。资料图片